

# 後藤新平與臺灣總督府顧問制度\*

王麒銘\*\*

## 摘要

1906 年 4 月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轉任參謀總長，佐久間左馬太接任總督，自 1898 年 3 月即擔任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留任原職。由於中央政府高層力邀後藤擔任滿鐵總裁，原先態度消極的後藤終於主動提出就職條件。獲當局首肯後，1906 年 11 月後藤轉往滿洲發展，仍兼臺灣總督府顧問，並兼關東都督府顧問。1908 年後藤有意辭去顧問，同年 7 月新內閣成立，後藤獲延攬入閣擔任遞信大臣，得以卸任顧問職。儘管擔任顧問不滿兩年（1906 年 11 月至 1908 年 7 月），但後藤仍藉此繼續指導後進，維持其在臺灣的影響力。本文考察後藤兼任總督府顧問之經緯，釐清顧問制度成立的脈絡，進而聚焦其擔任顧問期間與新任民政長官的互動情形，對後藤顧問扮演的角色進行個案分析。

**關鍵詞：**後藤新平、兒玉源太郎、佐久間左馬太、祝辰巳、臺灣總督府顧問

---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 2020 年 8 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第 11 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感謝大會邀請，以及評論人陳姪媛副研究員與鍾淑敏老師提示寶貴的意見。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 一、前言

後藤新平（1857-1929）自 1890 年代起，歷任內務省衛生局長、臺灣總督府（以下簡稱總督府）民政長官、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總裁、遞信大臣兼鐵道院總裁、內務大臣、外務大臣、東京市長，1923 年關東大地震後，再任內務大臣；許多官廳都有其同僚和部下，據學者研究，總督府直到 1924 年還在後藤的影響力之下。<sup>1</sup>儘管後藤未曾擔任政黨黨魁，也未成為內閣總理大臣（首相），但始終動見觀瞻，是近代日本政治史研究中備受矚目的人物，相關成果極為豐富。<sup>2</sup>本文針對向來未被深入探究的一環，考察後藤與總督府顧問制度之關係。

1898 年，兒玉源太郎（1852-1906）擔任總督，拔擢後藤擔任民政局長（旋改稱民政長官）。兩人上任之際，中央政府處於不穩的狀態，蓋日清（甲午）戰爭（1894-1895）結束後，當局面對棘手的財政問題卻不易輕言增稅，原因在於地主的反對以及地主階層支持的政黨擁有發言權。1898 年初，松方正義（1835-1924）首相解散眾議院，但增租派的議員在選舉中未取得優勢，松方內閣隨即總辭；1 月，伊藤博文（1841-1909）第三度組閣，2 月，任命兒玉為

---

<sup>1</sup> 就臺灣關係而言，官僚如中村是公、長谷川謹介、長尾半平、宮尾舜治、賀來佐賀太郎，學者如新渡戶稻造、岡松參太郎，都是後藤身邊親近的人物。後藤離臺時提拔祝辰巳擔任長官，祝於任內急逝，長官由大島久滿次擔任。1910 年起，與後藤頗有關係的內田嘉吉、下村宏、賀來佐賀太郎又連續擔任長官。直到 1924 年，後藤在政壇上的對手之一的加藤高明執政，任命伊澤多喜男擔任總督為止，總督府長期在後藤的影響力之下。參見季武嘉也，〈大正期における後藤新平をめぐる政治状況〉，《史學雜誌》，96：6（東京，1987.6），頁 1-31。關於伊澤總督如何對付臺灣的後藤勢力之個案研究，參見鍾淑敏，〈試論後藤新平與伊澤多喜男——從專賣局與鴉片事件談起〉，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編，《日據時期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頁 333-340。

<sup>2</sup> 對歷來後藤研究的綜合評述，參見張隆志，〈臺灣近代史上的後藤新平——歷史、神話與政治〉，收入徐天福編，《什麼人物 為何重要——臺灣史上重要人物（二）》（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1），頁 36-51。

總督。<sup>3</sup>在此種局勢下就任的後藤，發揮其手腕，總計將近九年的任期被認為是奠定日本治臺的關鍵時期。1906年4月，兒玉轉任參謀總長，佐久間左馬太（1844-1915）接任總督，後藤留任長官，約半年後擔任滿鐵總裁，仍兼臺灣總督府顧問，同時兼關東都督府（以下簡稱都督府）顧問。<sup>4</sup>

在《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中，可見後藤顧問排在總督、民政長官之後，其銜只有「從三勳一男」五字，意指從三位勳一等男爵。<sup>5</sup>如後所述，制度規定總督府與都督府得各置顧問，實際上顧問為同一人，且後藤以後無第二位。有關後藤擔任顧問一事，日治時期井出季和太所寫之《臺灣治績志》簡要提及顧問制度的成立與廢止時間，以及規定總督諮詢顧問的事項內容。<sup>6</sup>當事人的傳記方面，佐久間的傳記提及總督對後藤兼任顧問頗有難色，但在高木友枝（1858-1943）和祝辰巳（1868-1908）等人的折衝下，後藤順利兼任顧問。<sup>7</sup>後藤的傳記由其女婿鶴見祐輔（1885-1973）執筆，指出後藤為避免臺灣的政務因其離職而急劇改變，也為緩和對人民造成的衝擊，於是別出心裁想出此一方案；並介紹一封後藤寫給總督的信，該信縷述後藤接受高層勸進擔任滿鐵總裁，設置總督府與都督府顧問的方案得到西園寺公望（1849-1940）首相和山縣有朋（1838-1922）同意，<sup>8</sup>以及中央政府擬用勅令規定顧

<sup>3</sup> 小林道彥著，李文良譯，〈後藤新平與殖民地經營——日本殖民政策的形成與國內政治〉，《臺灣文獻》，48：3（南投，1997.9），頁101-121。

<sup>4</sup> 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設立關東總督府，大島義昌陸軍大將擔任總督，翌年（1906）9月改為關東都督府，大島從總督成為都督；都督府管轄關東州（遼東半島租借地），並負保護及監督滿鐵之責。參見陳豐祥，〈日俄戰後日本的對『滿』政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6（臺北，1988.6），頁155-220。

<sup>5</sup>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7），頁9；《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1908），頁11。

<sup>6</sup>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7），頁419。

<sup>7</sup> 財團法人臺灣救濟團編，《佐久間左馬太》（臺北：財團法人臺灣救濟團，1933），頁822。

<sup>8</sup> 西園寺出身「公家」，地位極為高貴，於明治維新後，不僅有實際的軍事和行政經驗，且曾留學法國，故常能以更大的格局思考日本走向。在政治上歷任多種要職以外，最重要的角色一般認為有二：一是繼伊藤博文之後擔任政友會第二任總

問制度，因此後藤曾請示總督是否贊同；更引用高木友枝的回憶，描述總督對顧問制度發脾氣，認為其有治臺能力，不必顧問操心；亦說明此事經高等官僚們議論後，由長谷川謹介（1855-1921）向總督報告才告一段落。<sup>9</sup>事實上，中央政府高層為此苦惱多時，絕非總督府幾位官僚的折衝所能解決。

學術論著方面，北岡伸一提及後藤於擔任滿鐵總裁時要求兼任都督府顧問，雖然遭到林董（1850-1913）外務大臣強烈的反對，最終獲得政府當局同意。<sup>10</sup>北岡也在所撰後藤傳記的名著中，略提後藤在佐久間總督的要求下留任長官，約半年後就任滿鐵總裁並擔任新設的顧問，其對臺灣統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sup>11</sup>也有研究提到顧問的主管事項不明確，其任務在「監督」關東都督與臺灣總督，主要用來監督都督府的政策。<sup>12</sup>臺灣國內則是黃福慶利用鶴見撰寫的後藤傳記等出版品，對此段過程有扼要的說明。<sup>13</sup>鍾淑敏論

---

裁，並在1906年繼桂太郎之後執政，與桂太郎輪流執政而形成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桂園時代」。第二個角色則是有「最後的元老」之稱，直到他去世前，舉凡宮中、內閣、及日本在國際外交上有重大事件發生時，屢見發揮影響力左右政壇。參見鳥海靖編，《歷代內閣·首相事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9），頁113-115。山縣為近代日本陸軍制度建立者，亦是明治時期至大正初期左右政局的重要政治家之一，曾兩度組閣（1889年12月～1891年5月、1898年11月～1900年10月）。山縣以豐富的軍事與行政經驗，以及元帥、元老等身分，長年發揮政治影響力，對日本內政與政黨政治，以及外交與各重大戰爭，經常在重要局面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山縣於本文研究的時段中，從侯爵成為公爵，亦是樞密院議長，因其特殊的地位，在其文書中可以發現有關佐久間總督、後藤新平等相關資料。參見鳥海靖編，《歷代內閣·首相事典》，頁24-26。

<sup>9</sup> 鶴見祐輔著，一海知義校訂，《正伝・後藤新平3台湾時代1898～1906年》（東京：藤原書店，2005），頁833-841。前引《佐久間左馬太》與鶴見的後藤傳記提到之高木友枝回憶，原始出處應為後藤去世後《臺灣日日新報》的連載。參見〈故後藤新平伯 高木友枝氏談（5）〉，《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9年4月18日，7版。

<sup>10</sup>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頁54-58。

<sup>11</sup> 北岡伸一，《後藤新平》（東京：中央公論社，1988），頁36。

<sup>12</sup> 齊藤容子，〈桂園体制の形成と台湾統治問題〉，《史学雜誌》，103：1（東京，1994.1），頁79。

<sup>13</sup> 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洲殖民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上（臺北，1986.6），頁383。

及後藤「自請任總督府顧問職，以干涉總督府施政及人事」，並指出這是殖民史上的特例。<sup>14</sup>本文則具體探討以下問題：第一，1906年後藤就任滿鐵總裁前後，中央政府如何處理後藤的人事案？第二，獲聘成為總督府顧問的經緯，以及擔任顧問期間如何參與臺灣統治事務？第三，辭去總督府顧問的經緯。最後，分析此一特殊的顧問制度反映何種政治史上的意義，俾有助吾人理解此時期臺灣政治史的特質。

## 二、後藤就任滿鐵總裁與擔任總督府顧問之經緯

日俄戰後如何經營滿洲，是1906年1月成立的西園寺公望內閣的重要課題之一，為此成立的滿鐵之第一任總裁由後藤新平雀屏中選。後藤出任的過程充滿曲折，本節特就與顧問制度之關聯進行深入探究。

### （一）滿鐵總裁就任問題

根據後藤的日記，後藤於1906年3月初在東京拜訪山縣有朋，得知佐久間左馬太將取代兒玉擔任新總督，以及新總督希望其留任長官。後藤向兒玉總督報告後，決定接受佐久間的邀請，乃向山縣表達明確的回覆。<sup>15</sup>當時關於兒玉在政壇的下一步，日本國內的媒體紛加推測，臺灣的主要報紙《臺灣日日新報》（以下簡稱《臺日》）也隨時彙整相關消息予以披露。時論認為兒玉的後繼人選極有可能是佐久間左馬太，並謂：「至民政長官一任，則依然以後藤長官留任，于本島百般之施政，毫與從前無異。雖此事尚未公然發表，姑依東電而記之。」<sup>16</sup>證諸後來的演變，該報掌握訊息的正確度頗高。4月11日，兒玉轉任參謀總長並獲授子爵，陸

<sup>14</sup> 鍾淑敏，〈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統治權的確立—1895年～1906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89），頁31-32。

<sup>15</sup> 鶴見祐輔著，一海知義校訂，《正伝·後藤新平3台灣時代1898～1906年》，頁826-827。

<sup>16</sup> 〈臺灣總督更任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3月14日，2版。《臺灣日日新報》的日文與漢文報導時有重複，為方便讀者閱讀，部分引用不做翻譯，直接呈現當時的漢文報導。原文標點符號經過調整，以下同樣。

軍大將佐久間子爵獲天皇親任為第五任臺灣總督，後藤續任民政長官並獲授男爵。<sup>17</sup>《臺日》社論指出，兒玉總督在任長達八年餘，前月來所傳異動之說實為公然的秘密，諒讀者必不致感到驚訝，加以後藤長官將留臺佐治新總督，施政方針料將維持現狀，若說真有改變之處，不過是總督的名字更換罷了。<sup>18</sup>

總督人事底定後，關於民政長官將在任多久的傳言，就連後藤也感受得到。後藤在 6 月 1 日寫給兒玉參謀總長的信中提及，新總督上任後，外界雖有關於後藤留任至何時的傳聞，但整體而言臺灣的民心安定。<sup>19</sup>民政長官異動之說與滿鐵總裁候補人選的輿論有關。當時可能成為滿鐵總裁的人選，軍人有大島義昌（1850-1926）關東總督，文官有清浦奎吾（1850-1942）、大浦兼武（1850-1918）等人之說，<sup>20</sup>且盛傳文官與陸軍隱然有激烈的競爭意識。倒是關於總裁與副總裁該由何種背景的人士出任，一般認為其資格可望是「第一流的政治家」搭配「敏腕的技術家」。<sup>21</sup>亦有報導謂：「然據推測云，總裁必為兒玉子麾下之人，其人未必直為軍人，唯樂立於關東總督之下，而受其指揮之人而已。故未必如世人之想像，而為知名之老人也云。」<sup>22</sup>符合上述條件者屈指可數，後藤的

<sup>17</sup> 「兒玉總督子爵ヲ後藤長官男爵ヲ授ケラレ兒玉總督參謀總長ニ佐久間大將臺灣總督ニ任セラレ祝電及各官衙ニ通知ノ件」（1906.4），〈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六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227053。為節篇幅，以下引用《總督府公文類纂》時，僅顯示件名與典藏號。值得一提的是，兒玉與後藤獲得昇敘爵，但並未獲得天皇下賜金。關於此事，根據 4 月 6 日桂太郎寫給西園寺首相的書信可知，桂從山縣有朋得知宮中的情形，山縣建議此次只處理兩人之昇敘爵，而不併行下賜金，桂對此表示同意；桂在信中希望西園寺也同意這個想法，並請首相將此意見轉達宮內大臣（田中光顯）。參見千葉功編，《桂太郎發書翰集》（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頁 221-222。

<sup>18</sup> 〈前總督、新總督〉、〈臺灣總督更迭表〉，《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 年 4 月 12 日，2 版。

<sup>19</sup> 尚友俱樂部兒玉秀雄關係文書編集委員會編，《兒玉秀雄關係文書 1 明治·大正期》（東京：同成社，2010），頁 22。

<sup>20</sup> 〈滿鐵總裁候補〉，《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 年 6 月 26 日，1 版。

<sup>21</sup> 〈滿鐵正副總裁〉，《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 年 7 月 18 日，1 版。

<sup>22</sup> 〈南滿鐵道總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 年 7 月 24 日，1 版。

名字旋出現在「最有力之候補者」名單中。<sup>23</sup>雖然報上已認定後藤具有潛力，但後藤要成為滿鐵總裁，實際上是在中央政府當局運作下才告實現。以下根據時任內務大臣的原敬（1856-1921）之日記整理其經過。<sup>24</sup>

約1906年7月，西園寺首相曾向原敬談及滿鐵總裁人選，原敬贊同其意見，亦認為後藤適任。兩人的看法一致，乃分頭進行；西園寺負責山縣有朋及寺內正毅（1852-1919）陸軍大臣等人，<sup>25</sup>後藤則由原敬打電報請後藤上京。7月22日，後藤抵京後拜訪原敬，原敬在談話中稍微透露用意，力勸後藤接下此一人事任命，惟後藤表示須經審慎思考才能做出決定。<sup>26</sup>接著後藤去見首相，被勸就任滿鐵總裁，但後藤認為過去沒有從事商業經營的經驗，且對滿鐵的事業內容不明瞭，推辭不就。首相則表示臺灣統治獲致成功，業已累積相當的經驗才是，盼能為滿洲別開生面。即使首相親自邀請，但後藤直說臺灣快速達成財政獨立，深恐速成的結果，必然引起弊害，此時若離任則將打擊臺灣統治成果。同時，闡述仍有諸多計畫待完成，例如：水利灌溉設施、發電事業等。西園寺聽了後藤有關臺灣發展的議論，最後要其再作考慮並去見兒玉參

<sup>23</sup> 〈滿鐵正副總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7月31日，1版。日本國內報紙報導較多的是關於後藤能否出任總裁、能否擔任關東都督府顧問（詳見後述），因本文主要探討臺灣總督府顧問問題，故省略此方面的資料。

<sup>24</sup> 原敬於司法省法學校肄業後，曾任《郵便報知新聞》記者，接著任職外務省，被派至天津、巴黎勤務。其獲得陸奧宗光的賞識與提拔，而有機會歷練中央官職，曾任外務省通商局長、外務次官，也曾短暫擔任駐朝鮮公使。離開政界後，曾任《大阪每日新聞》社長。1900年參與伊藤博文創立的立憲政友會，且在伊藤第四次組閣時擔任遞信大臣（1900年12月至翌年6月在任）。1902年以後連續當選眾議院議員。本文探討的1906年至1908年間，原敬擔任內務大臣，在其日記中記述政界的資訊頗為豐富，從中可了解其政局觀、政治手腕等。1910年代其率領政友會擴張黨勢，1918年組閣，1921年11月在東京車站被刺殺身亡。參見鳥海靖編，《歷代內閣·首相事典》，頁174-178。

<sup>25</sup> 寺內與山縣有朋、桂太郎等人，被認為是近代日本最重要的軍人政治家之一。本文研究的時期中，其人先是擔任第一次桂太郎內閣的陸軍大臣，1906年西園寺內閣成立後仍留任陸軍大臣，且擁有陸軍大將、子爵的身分，1910年代曾任朝鮮總督、內閣總理大臣。參見鳥海靖編，《歷代內閣·首相事典》，頁157-158。

<sup>26</sup>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二卷》（東京：乾元社，1951），頁363。

謀總長。這是西園寺與兒玉事先講好，即由前者勸後藤就任，由後者說明鐵道問題，由山縣說服佐久間總督答應讓後藤離職。結果兒玉也加入勸說的行列，更要後藤直接去拜訪山縣。<sup>27</sup>後藤上京面見原敬、西園寺、兒玉、山縣後，打電報向總督報告，提及山縣曾說可以考慮將總裁就任延期至1907年2月；23日下午，總督覆電表示了解，並認為後藤對他們的「答辯」可說是重「然諾」的表現。<sup>28</sup>由此可推測，後藤還未做好轉換跑道的心理準備，仍以擔任民政長官為優先。

後藤接連拜訪原敬等人，當他結束忙碌的一天，翌日清晨卻傳來兒玉急逝的噩耗。後藤向兒玉的請益，為兩人最後一次晤談。<sup>29</sup>為辦理兒玉的喪事，後藤就任總裁之事有所耽擱，7月24日和25日，後藤見了西園寺和山縣，再度拒絕推舉；27日再見二人時，後藤說明其構思，提出在現行官制許可範圍內能否用權宜方式來處理，獲得二人採納。<sup>30</sup>7月底，後藤又訪問原敬，原敬勸其勇於承擔，責無旁貸地投身滿洲經營，但後藤仍不為所動，並向原敬表示滿洲經營若由山縣元帥擔任總裁，願在其指揮下任事。在原敬看來，後藤似乎想複製過去在臺灣的兒玉總督加上後藤長官之模式，將其置換成山縣總裁加上後藤副總裁，才肯答應當局對其人事異動的安排。原敬認為後藤的態度不夠積極，遂再力勸

---

<sup>27</sup> 後藤新平，《日本植民政策一斑》（東京：拓殖新報社，1921），頁47-59。此資料為後藤於1914年6月在貴族院幸俱樂部演講時，提供其當年呈西園寺首相等人的書信作為參考，後收入本書。本文後以〈滿鐵總裁就職情由書〉為題，刊登於《滿蒙》。參見〈滿鐵總裁就職情由書〉，《滿蒙》，17：2（大連，1936.2），頁327-338。

<sup>28</sup> 原文寫作「前諾」，應為「然諾」之誤植，蓋兩者發音相同。參見〈佐久間總督より接受したる電信〉，收入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委員會編，《後藤新平文書（微卷）》（東京：雄松堂，1979），R37。

<sup>29</sup> 後藤回憶，兒玉希望後藤擔任滿鐵總裁，兩人從中午過後談論至下午約四點，後藤仍未首肯，當兒玉送到玄關時，還不忘勸後藤要思考如何把事情做好，不能消極地一味拒絕，並要他考慮清楚後再來，沒想到這是最後一次相見。參見立石駒吉，《後藤新平論集》（東京：伊藤元治郎發行，1911），頁37-38。

<sup>30</sup> 後藤新平，《日本植民政策一斑》，頁59-60。

宜獨當一面，經過原敬再三開示，後藤終於轉變心意。<sup>31</sup>

7月31日，後藤呈就職條件給山縣；翌日，呈該條件給首相。<sup>32</sup>後藤也寫信報告山縣，表示已向首相提書面列出就職條件，正在等待回答。<sup>33</sup>8月1日，後藤拜訪原敬，表示確定擔任滿鐵總裁。然而，當初佐久間赴任總督前，政府當局曾約定暫時不更動後藤的位置，關於此點，原敬在8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已接佐久間總督來信表示：若政府確實需要後藤，則無任何異議。因此，原敬樂觀地認為有關後藤的人事問題應該不難處理。<sup>34</sup>受限於資料不足，僅能推測後藤約於8月1日亦向總督發電報告，翌日，總督覆電後藤，表示為國家大計著想，即使對臺灣而言甚為遺憾，不得已只好同意。<sup>35</sup>

後藤上京約兩周後，圍繞滿鐵總裁就任問題，高層間有密集的交涉。滿鐵總裁的人事若未先確立，自然不會發生兼任都督府顧問的問題；而當滿鐵總裁人事可望解決時，顧問問題便浮上檯面。8月6日，西園寺寫信給山縣，報告有關採用後藤擔任滿鐵總裁一事，日前已請寺內陸相打電報給佐久間總督，業已得到總督回信，請山縣過目；並報告有關顧問之事，法制局長官正在調查制度上是否會發生疑義。<sup>36</sup>

8月8日，後藤與大島都督在寺內陸相官邸會面，就滿洲經營之重要事項寫成書面留存，並複寫一份呈給山縣，以備他日參考。<sup>37</sup>11日，後藤即將返臺前又去拜訪原敬，說明日前在山縣的宅邸見了大島都督，後藤主張以顧問身分參與都督府的政策。蓋後藤認為滿洲經營以鐵道為主，都督行政為輔，由是提出此種主

<sup>31</sup>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二卷》，頁364。

<sup>32</sup> 後藤新平，《日本植民政策一斑》，頁60。

<sup>33</sup> 尚友俱樂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編纂委員會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2》（東京：山川出版社，2006），頁118-119。

<sup>34</sup>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二卷》，頁364。

<sup>35</sup> 〈佐久間總督より接受したる電信〉，收入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委員會編，《後藤新平文書（微卷）》，R37。

<sup>36</sup> 尚友俱樂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編纂委員會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2》，頁143。

<sup>37</sup> 後藤新平，《日本植民政策一斑》，頁60。

張，其見解得到山縣和大島的同意。其後，後藤向寺內和大島提出書面，而對西園寺首相方面亦已由大島進行報告；至於對總督府方面，後藤將以顧問身分繼續參與總督府的政策，關於此事必須取得總督同意，後藤向原敬表示山縣願意居中協調。從原敬的日記可知，後藤向山縣與大島提出擔任顧問的要求，原敬事先知情，也贊成後藤如此做法，交涉過程亦頗順利。<sup>38</sup>

然而後藤擔任滿鐵總裁與兼任顧問一案，意外引起政壇風波。8月13日，原敬前往拜訪西園寺首相，得知當天早上林董外務大臣來訪首相，林不僅反對後藤出任滿鐵總裁，也反對在都督府設置顧問，尤其認為後者是「武人跋扈」的結果，對首相的說明完全聽不進去。林離去後，西園寺請原敬來談此事，原敬認為林誤會此一人事安排的意義，事實上正好相反。蓋滿洲經營須先使鐵路上軌道，捨此別無他法，山縣等人面對此一現實，只得同意後藤出任滿鐵總裁，毋寧說是「武人政治」的挫折。為消除林外相的誤解，原敬向西園寺保證將與林再談此事，並談妥14日的內閣會議暫不提出此案。值得注意的是，原敬記述此一插曲極有可能是都督府民政長官石塚英藏（1866-1942）向林董提供意見，林才會向首相直接表達反對。原敬做此判斷的根據是，日前石塚曾向他談過此事，但原敬並未採納；在原敬的眼中，林外相被石塚給利用了。<sup>39</sup>反對後藤兼任都督府顧問者，尚有樞密顧問官清浦奎吾、<sup>40</sup>法制局長官岡野敬次郎（1865-1925），兩人的行動限於資料無法掌握。石塚則比較清楚，不僅有上述的行動，甚至在從東京返回任地滿洲的途中，到京城拜會伊藤博文，確認伊藤對此案也表示反對意見。<sup>41</sup>對於石塚的行動，後藤在19日寫給寺內陸相的信

<sup>38</sup>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二卷》，頁366-367。

<sup>39</sup>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二卷》，頁367。

<sup>40</sup> 〈顧問兼攝の排斥〉，《萬朝報》（東京），1906年9月15日，2版。據報載，清浦對後藤兼任都督府顧問有異議，並計畫加以反對。惟因資料有限，內情不詳。

<sup>41</sup> 東亞同文會編，《續對支回顧錄（下）》（東京：原書房，1981），頁510-511。原本刊行於1941年。

中即提到「關於顧問制度，石塚似在玩弄小策」。<sup>42</sup>

8月22日，原敬拜訪林董，林聽了原敬有關後藤兼任兩府顧問的分析，仍不願改變其主張。隨後原敬拜訪首相，向其報告與林外相談話的情形。<sup>43</sup>同一天，後藤也將7月下旬上京以來的動向寫成就任理由書，陸續分送林董、山縣、西園寺等人。<sup>44</sup>8月23日，林董又拜訪首相，表明其所持的反對意見不會改變。原敬與首相見面後，認為此事亟需處置，決定翌日招外務次官來一談；兩人擔心林可能藉故辭職，對此可能發生的危機必須有所因應。<sup>45</sup>蓋在明治憲法體制下，首相與其他大臣並無高低之別，內閣成員意見不一致時，往往即是內閣瓦解的瞬間。

8月28日，原敬出席內閣會議，當天林董未出席。寺內請原敬到另室談話，表示假若林堅持己見，則首相只有辭職一途，然而環視目前政壇，恐無適當人選可以扛下後繼內閣的重任；加以預算尚未通過，若內閣更迭，則後果不堪設想，必須想辦法讓林改變主張，使其同意後藤的人事安排。原敬和寺內儘管憂心忡忡，雙方的意見交換沒有具體結論，只達成一項共識，即務必早日讓問題得到解決。內閣會議後，西園寺向原敬提到珍田捨己（1857-1929）外務次官前往葉山（位於神奈川縣三浦半島）拜訪林外相之後，林外相仍不打算改變主意。西園寺認為，事到如今只有前往京都拜訪山縣，討論內閣辭職。不過，原敬認為此時拜訪山縣不妥，且只因林一人的關係就導致內閣辭職，實屬下策，在與元老談話時可提及辭意，但萬萬不可付諸實施，更宜儘速召開臨時閣議詢問閣僚們的意見，林以外的閣僚如皆持一致的看法，則採取手段使林能配合主流，若是林仍然不為所動，則設法讓其辭職。此案由於問題敏感，據原敬的記述，僅有西園寺、寺內及原敬知

<sup>42</sup> 馱場裕司，《後藤新平をめぐる權力構造の研究》（東京：南窓社，2007），頁102。

<sup>43</sup>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二卷》，頁369。

<sup>44</sup> 後藤新平，《日本植民政策一斑》，頁63-65；鶴見祐輔著，一海知義校訂，《正伝・後藤新平4滿鉄時代1906～08年》（東京：藤原書店，2005），頁76。

<sup>45</sup>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二卷》，頁369。

情。<sup>46</sup>值得注意的是，同日寺內寫信向山縣報告，謂解決之道在於西園寺與林談條件，趁林養病休假期間發布勅令，這樣處理雖不完美，卻難有更好的處置，並將通知後藤此事。<sup>47</sup>推測寺內與西園寺已達成發布勅令的默契。

8月30日，原敬拜訪首相，針對林董問題的處理進行討論，兩人決定以林生病暫時休養為由，由他人臨時代理職務，趁此期間發出設置顧問的勅令。發布勅令的時機，由於林已派珍田攜其辭呈交予首相，首相業已決定上奏天皇，待天皇退還外相辭呈後，由首相暫時兼任外相職務。<sup>48</sup>為使勅令能順利發布，西園寺還有一個環節必須確保不生差池。31日，西園寺寫信給海軍大臣齋藤實（1858-1936），說明採用後藤為滿鐵總裁，惟仍有必要使後藤與臺灣有所聯繫；而在都督府方面，有必要讓該府與滿鐵保持關係，加以後藤需與清國大官交涉，也有必要給予其相應的待遇（按：親任待遇，詳後），請齋藤務必在閣議案中署名。本案因時間緊迫，西園寺此函並非寄信，而是遣專人持交齋藤。<sup>49</sup>西園寺的最終決定可說是折衷方案，如此一來，1906年1月剛起步的內閣不因林董問題而前功盡棄，後藤的人事問題也順利獲得解決。1906年，在法制局立案設置兩府顧問的公文書中，可見外務大臣署名欄有西園寺內閣總理大臣之簽名，此案經內閣會議認可，9月1日經天皇裁可後公布，是為勅令第242號。<sup>50</sup>

<sup>46</sup>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二卷》，頁369-370。

<sup>47</sup> 尚友俱樂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編纂委員會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2》，頁383-384。

<sup>48</sup>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二卷》，頁371。

<sup>49</sup> 立命館大学西園寺公望伝編纂委員會編，《西園寺公望伝·別卷1》（東京：岩波書店，1996），頁122。

<sup>50</sup> 〈台湾總督府及關東都督府二顧問ヲ置ク〉，明治39年8月（1906.8），收入《公文類聚》（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檔號：A01200243500；〈御署名原本·明治三十九年·勅令第二百四十二号·台湾總督府及關東都督府二顧問ヲ置クノ件〉，明治39年9月（1906.9），收入《御署名原本（明治）》（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檔號：A03020684400；〈勅令〉，《官報》（東京），第6955號，1906年9月3日，頁17；〈法律及勅令抄錄〉，《府報》（臺北），第2041號，1906年9月13日，頁38。

## （二）總督府顧問設置問題

1906年9月初日本國內有報紙預測後藤就任滿鐵總裁後，同時將兼任兩府的顧問。<sup>51</sup>《臺日》亦報導：

南滿洲鐵道會社總裁選任所關，已有廟議，一時內地諸新聞，各說下馬評，區區不一。然據所確聞，係決定為後藤男爵，而新任民政長官，亦如所傳說，決定為祝財務局長，本月中當必發表。但後藤男爵，兼任總督府顧問，依然遙執本島之統治，至各部局高等官以下，仍照從前，各盡其職，施政上概無何等變動。<sup>52</sup>

預告後藤轉任滿鐵總裁並兼新設的顧問，以及新長官由祝辰巳出任。該報另有長文專論兒玉總督與後藤長官之搭配可謂合作無間，故能迅速獲得足堪誇耀世界的統治成績，接著感嘆民政長官更迭，略謂：「猶幸前督去而長官仍留，則臺政之方針不改常度，何其容易秋風，瓜期已屆，至近竟有民政長官更迭之事。」儘管該文對當局的決定感到不捨，基於後藤歷來的成就有目共睹，仍然高度肯定後藤必將發揮所長，再度獲得經營上的成功，略謂：「鐵道經營之所關，或得或失，帝國之榮辱實於焉繫之，則知非常之經營，必得非常之人物，有非常之魄力，具非常之手段，而後可以奏厥膚功焉。以後藤長官當其任，必能如臺灣統治之成功，無容疑也。」<sup>53</sup>時論對後藤的期待之深切，可見一端。

後藤即將擔任總督府顧問，雖已在報紙公開，但背後仍有複雜內情。9月2日，西園寺寫信給山縣，提到後藤打電報給寺內，在該電報中謂總督反對顧問制度。西園寺此信的用意是，關於此事政府內部經過各種議論，結果即將刊登在《官報》，希望山縣

<sup>51</sup> 〈臺灣總督府關東都督府顧問設置〉，《東京朝日新聞》（東京），1906年9月4日，2版。

<sup>52</sup> 〈民政長官之更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9月5日，2版。底線為筆者所加，以下同樣。

<sup>53</sup> 〈後藤長官之更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9月6日，2版。

對總督勸說曉諭。<sup>54</sup>佐久間接到山縣的來信後並未立即回信，其理由是前往視察「蕃地戰況」，即對原住民展開的「理蕃事業」。13日，佐久間在回給山縣的信中表明，其日前即表示不反對後藤轉任，但對顧問制度頗有抱怨，謂其剛接到後藤的意見書，<sup>55</sup>尚未確定看法，後藤卻又向寺內運作（按：指打電報給寺內），勞駕山縣元帥出來勸諭，對此深感慚愧。佐久間認為既然勅令已公布，只好同意顧問制度，文末更重申絕不會對後藤做出「開戰此種拙劣之動作」，兩人仍會和平相處。<sup>56</sup>持平而論，後藤在臺已有八年多的經驗，佐久間除倚重後藤來統治臺灣外，別無選擇。儘管仍有賴後藤輔佐，佐久間不反對後藤就任滿鐵總裁，只是後藤為了顧問制度逕向中央政府道佐久間之不是，而引發總督不快。

9月17日，原敬拜訪西園寺首相，兩人協議有關後藤辭去民政長官之事，並請首相過日後藤寫給原敬的書信。<sup>57</sup>19日，原敬在日記中寫下處理後藤人事問題所費的苦心，並慶幸最後能以變通的方式設置顧問。勅令發布後，18日首相亦解除兼任之外相職務。另一點記述是，由於林董確實曾提出辭呈，外界對此事有頗多揣測傳聞，原敬的態度是一概以林外相純係生病而由他人臨時代理職務，堅持否認到底。<sup>58</sup>可見原敬認為事情已經結案，不願再生枝節。

後藤確定轉任滿鐵總裁並擔任兩府的顧問，消息傳開後，《臺日》以社論肯定中央當局的決定，略謂：「當總裁之任者，宜有行政、理財及外交等各種廣汎之智識，並有破斷根節之鋼鐵手段，而後能勝任。是以中央政界雖濟濟多士，未易得總裁大適之才，所以推選夫後藤男爵也。」同時，強調：「況男爵雖不在

---

<sup>54</sup> 尚友俱樂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編纂委員會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2》，頁143-144。

<sup>55</sup> 收入後藤新平，《日本植民政策一斑》，頁67-70。此即上述鶴見祐輔執筆後藤傳記時所介紹後藤寫給總督的信。

<sup>56</sup> 尚友俱樂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編纂委員會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2》，頁157-158。

<sup>57</sup>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二卷》，頁378。

<sup>58</sup>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二卷》，頁379-380。

民政長官之職，然聞將來長為總督府之顧問，仍于本島之統治上有所獻替，更可對本島之前途而無煩顧己。」<sup>59</sup>顯然的，歡迎後藤擔任總督府顧問。後藤提出長官辭呈，又打電報向內閣表示希望更迭時間為9月下旬，於是中央政府著手上奏及顧問人事案相關事宜。<sup>60</sup>

9月28日，在臺北新公園舉辦後藤長官送別會，據報載：「與會者合全島官紳，約有二千人以上也。」<sup>61</sup>1906年的臺灣，在臺日本人與部分臺灣人先感受到與兒玉前總督「死別」之痛，再嘗到與後藤長官「生離」之苦。<sup>62</sup>報章雜誌充滿惜別之情與寂寞之聲；與後藤有關的臺灣慣習研究會在其機關誌一面惋惜後藤離臺，同時喜見後藤仍負「最高顧問之責任」。<sup>63</sup>送別會後，後藤就任總裁之路還有以下一段故事。

後藤在向西園寺首相提出就任總裁的條件中，列有一條關於總裁就職後享親任待遇的要求。<sup>64</sup>關於此事，10月29日原敬拜訪首相，報告當天早上和後藤的談話內容，原敬認為，後藤雖兼任兩府顧問，但享有親任待遇之事窒礙難行，要後藤斷念。後藤則回應，如此滿鐵的事業勢必規模縮小，並提出新的想法，亦即是由其專任總裁而不兼顧問，或由他人擔任總裁而自居副總裁地位。根據原敬的記述，給予後藤享有親任待遇的構想最初來自山縣有朋，山縣計畫讓後藤以宮中顧問官的方式獲得親任官待遇，但後來山縣基於種種考量（例如：名額等）決定作罷，即使改以後藤擔任兩府顧問為由使其獲得親任待遇之議，山縣仍然反對。從8月到10月下旬，為了後藤擔任顧問的問題，已因林外相固持已見而生起風波，如果此時後藤不願兼任顧問，甚至讓他人擔任總裁，情況會如何演變，外界將如何反應，甚難逆料，難保不會有

<sup>59</sup> 〈南滿鐵道及總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9月19日，2版。

<sup>60</sup>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二卷》，頁381。

<sup>61</sup> 〈長官送別會狀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9月29日，2版。

<sup>62</sup> 〈後藤長官將に去らんとす〉，《法院月報》，2：10（臺北，1906.10），頁77。

<sup>63</sup> 〈後藤男爵の台湾慣習研究上に於ける功績〉，《臺灣慣習記事》，6：10（臺北，1906.10），頁52。

<sup>64</sup> 鶴見祐輔著，一海知義校訂，《正伝・後藤新平4滿鉄時代1906～08年》，頁59。

新的波折發生，於是西園寺託原敬再與後藤詳談。<sup>65</sup>

10月30日，原敬拜訪後藤，希望後藤擔任滿鐵總裁及兩府的顧問，至於顧問不能享有親任待遇一事，亦盼後藤理解首相的苦衷。原敬為說服後藤，向後藤解釋西園寺組閣時曾考慮邀請後藤入閣、相當器重後藤。進而以同為東北人出身者的角度，談到東北地方的人不若其他藩閥，必須歷經辛苦奮鬥始有今日的地位；原敬訴諸同鄉情誼對待，後藤也吐露其心境，嘆息陸軍跋扈，並強調親任待遇並非為自身著想。<sup>66</sup>原敬的故鄉為今岩手縣盛岡市，後藤則是該縣奧州市，東北一帶於明治維新時反對新政府，故明治新政府成立後，東北人頗受壓抑，在政界難有出人頭地的機會；有志難伸的青年，或投身軍事方面（例如：齋藤實），或藉由學問知識以求在新時代嶄露頭角（例如：原敬、後藤等）。經過一個下午的長談，後藤與原敬縮短彼此的距離感。

從原敬日記所提供的資訊，或者說從原敬的立場來看，山縣同意後藤出任滿鐵總裁，且贊成後藤以顧問身分參與都督府的政策，最初又願意幫忙爭取親任待遇，但卻中途而廢，甚至反對後藤享有親任待遇，這些因素都造成後藤的不滿，引起後藤心生退意，不願負滿洲經營之總責，只願扮演其最擅長的副手角色。限於資料尚無法證實後藤此一舉動是否以退為進，惟無庸置疑的，原敬為安撫後藤、消弭可能的政治危機，可謂費盡心思。

10月31日上午，後藤答覆原敬，決定遵從首相的意見，願擔任滿鐵總裁兼兩府的顧問，對親任待遇則不再強求。<sup>67</sup>後藤的人事問題，前有林董的介入，加上石塚等人的反對，後有後藤的態度搖擺，直到10月底才正式確定。這些外界不知的內情，若非原敬日記的記載，無法窺知其細節。當然，原敬日記一如其他政治家的日記，本就有意引導後世讀者建構其身為政局指導者的形象，解讀時必須謹慎。要之，西園寺等人的溝通奏效，後藤的滿鐵總

<sup>65</sup>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二卷》，頁394-395。

<sup>66</sup>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二卷》，頁395。

<sup>67</sup>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二卷》，頁395-396。

裁就任問題與總督府顧問設置問題獲得解決。

在後藤向總督提出的辭呈中，辭職的理由並非轉任滿鐵總裁，而是「今後將專心於貴族院議員之職務」；1906年9月，總督向內務大臣內申此案，理由是後藤因「疾病不堪任職」而請求退官。上述兩項理由都不是真正的原因。11月13日正式發令，後藤獲准辭去民政長官，改兼總督府顧問，同時獲陞敘勳一等。翌日總督府以電報及電話通知各官廳等單位。<sup>68</sup>有關敘勳一事亦值得一提。由於4月後藤獲封為男爵時，內閣在向天皇的上奏中報告，今後不再以後藤在臺灣的功勞為由請求陞敘，故後藤能獲敘勳一等，實係首相以特賜為名上奏，而使其享此殊榮。<sup>69</sup>後藤即日發電報向總督報告其獲授勳、免去本官，以及領受兼任兩府顧問、專任滿鐵總裁之辭令。翌日，總督回電，表示欣聞男爵之喜事，祝賀後藤。<sup>70</sup>又據報載，後藤兼任兩府顧問制度原本頗受報紙等批評，見後藤獲敘勳一等、授旭日大綬章後，「則曩之論難批評諸新聞紙，皆如寒蟬之噤，不復出聲」。<sup>71</sup>後藤的人事問題不再是新聞感興趣的題材。<sup>72</sup>

後藤離臺、新任民政長官正物色中，此事早已不是傳聞，約在10月初，即可見《臺日》報導：

據東京新聞云，關後藤民政長官之後任問題，現有種種風

<sup>68</sup> 「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依願免官殖產局長祝辰巳民政長官二任用ノ件」（1906.9），典藏號：00001237062；「元民政長官男爵後藤新平二恩給下賜ノ儀上申該證書交付ノ件」（1907.2），典藏號：00001273002；〈敘令及辭令〉，《府報》（臺北），第2079號，1906年11月15日，頁28。

<sup>69</sup>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二卷》，頁399。

<sup>70</sup> 「後藤民政長官敘勳及南滿洲鐵道會社總裁並臺灣總督府顧問等仰付ラレノ件」（1906.9），典藏號：00001237061。

<sup>71</sup> 〈東京雁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11月25日，2版。

<sup>72</sup> 附帶一提的是，後藤擔任滿鐵總裁又身兼兩督府顧問，不過因未享有親任待遇，其在宮中的席次排在相當後面。蓋宮中席次有嚴格的規定，各皇族以下分為大勳位（伊藤博文統監、山縣有朋元帥、大山巖元帥等）、親任官（首相及各國務大臣、臺灣總督等）、親任官待遇（各師團長、各司令官等）、勳一等，後藤即屬於勳一等之列。參見〈宮中席次〉，《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7年2月9日，1版。

說，獨言必為祝辰巳氏者居多，……又關石塚民政長官曰，關東民政長官石塚英藏氏，以為滿鐵總裁，若兼都督府顧問，則與行政組織相反對，故自上京以來，日唯奔走於有力者之間；然廟議既有決定，石塚氏或至自辭其職歟。以上云云，與本社之所聞者略有異同，姑記之，以俟後報。<sup>73</sup>

1906年11月，民政長官更迭，如所預料，繼任者是殖產局長祝辰巳。<sup>74</sup>後藤順利交棒給其信賴的部下，確保後藤勢力得以鞏固。

結束本節前，針對上文中屢次出現的石塚與後藤之關係，稍作補述，整體的考察留待另文再探。兩人關係不睦，當時已是公開的事實，石塚在反對後藤兼任顧問過程時的奔走情形，就如《臺日》所言：「據內地諸新聞所報，言人人殊，有讀之足令人噴飯者，有與我社相反者，又有全屬創聞者。要之，皆捕風捉影之談，不足取信者也。」<sup>75</sup>由於石塚、林董等人反對後藤兼任顧問之事不了了之，難以追究該期間內的細節，但從旁人的觀點來看，石塚與後藤的不合在政界高層眼中看得一清二楚，私人書信可以證明此點。例如：事件正在演變中的1906年8月，寺內陸相寫給山縣有朋的信中，提到：「林董的固執，或許來自石塚民政長官的反對說。」<sup>76</sup>又如1907年1月桂太郎（1847-1913，前任首相）寫給寺內的信中，附有大島都督先前寫給桂的書信（按：僅有部分，判斷時間在1906年底），大島明白地寫道：「後藤男與石塚之間有所不合，石塚最初就對顧問制度唱反調，此事想必您（按：桂太郎）也深知。」<sup>77</sup>1907年，石塚離開滿洲，前往伊藤博文所在的統監府任職，又過了二十多年後擔任臺灣總督，則是另一段有待考察的歷史。

<sup>73</sup> 〈民政長官後任問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10月9日，1版。

<sup>74</sup> 「民政長官交迭ノ旨陸海軍幕僚へ通知ノ件」（1906.11），典藏號：00001237066。

<sup>75</sup> 〈滿鐵總裁及石塚長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10月13日，1版。

<sup>76</sup> 尚友俱樂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編纂委員會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2》，頁382。

<sup>77</sup> 千葉功編，《桂太郎發書翰集》，頁284-285。

### 三、總督府顧問制度之成立及運用

總督府的「顧問」，在後藤之前已有數人有此頭銜，嚴格而言，其地位接近各領域專家中的最高級待遇。後藤與日本的臺灣統治，關係最早可溯至其受總督府委託擔任衛生顧問；1896年4月，時任內務省衛生局長的後藤擔任總督府的衛生顧問，每年津貼1,000圓，1898年3月卸任。<sup>78</sup>後藤擔任衛生顧問期間，負責規劃臺灣的鴉片制度與衛生制度，為其參與殖民地經營之起步。<sup>79</sup>

如所周知，日本政府與總督府經常聘請各領域的學者專家從事調查、研究、立案、執行實務等工作，基本上是以「囑託」（約聘、特聘）的名義採用。其中，擁有「顧問」頭銜者，最知名的或許是日治初期向司法省提出關於臺灣統治政策的英國籍顧問卡庫德（William Kirkwood Near, 1850-1926）；其不僅提出報告書，且曾來臺考察，更於兒玉與後藤赴臺就任前當面提供意見，兒玉甚至有意聘其為總督府顧問，但最終未果。<sup>80</sup>另一位向司法省提出臺灣統治政策意見的是法國籍顧問盧朋（Michel Joseph Revon, 1867-1947）。<sup>81</sup>此外，1870年代即來臺行醫的英國人梅爾（William Wykeham Myers, 1845-1920），頗通曉臺情，總督府將其聘為顧問（1897-1899年），並給予年薪6,000圓。<sup>82</sup>而在外國人技術專家方面，東京帝國大學工科大学的外國人教師巴爾頓（William Kinninmond

<sup>78</sup> 「後藤新平衛生顧問囑託ノ件」（1896.4），典藏號：00000119021；「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衛生顧問囑託ヲ解ク」（1898.3），典藏號：00000332054。

<sup>79</sup> 有關後藤的醫學理念及其在臺灣的各種作為，參見范燕秋，〈新醫學在臺灣的實踐（1898-1906）——從後藤新平《國家衛生原理》談起〉，《新史學》，9：3（臺北，1998.9），頁49-86。

<sup>80</sup> 吳密察，〈外國顧問 W. Kirkwood 的臺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93），頁1-27。

<sup>81</sup> 伊藤桃子，〈日本明治政府司法省顧問盧朋的殖民地統治構思：以遼東、臺灣統治政策論為中心〉，《大仁學報》，39（屏東，2011.9），頁35-63。

<sup>82</sup> 橋本白水，《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30），頁113。有關 Myers 與總督府之關係，參見長谷部茂，〈西洋人は日本統治以前の台湾社会をどう見たか：総督府英国人顧問マイヤース「台湾自治制度」意見書を事例として〉，《拓殖大学臺灣研究》，創刊號（東京，2017.3），頁29-52。

Burton, 1856-1899) 獲聘擔任總督府衛生工事顧問技師，致力於規劃與興建各地的自來水工程等。<sup>83</sup>以上反映日本取臺之初，急需仰賴出身先進國家的專家們提供資料和協助作為施政之參考。

至於曾任職總督府而在離職後擔任顧問的日本人，有伊澤修二(1851-1917)、後藤新平、長谷川謹介。伊澤參與草創臺灣的教育，1897年6月因學務部組織縮減，7月伊澤部長被命非職，8月擔任學務顧問，據報載，其年俸千圓。<sup>84</sup>伊澤於1898年6月再度來臺，並提出報告書呈兒玉總督；<sup>85</sup>同月，解除顧問。<sup>86</sup>長谷川歷任鐵道部技師長、鐵道部長，被認為是日治時期鐵道建設的奠基者；<sup>87</sup>1908年12月，甫轉任鐵道院東部管理局長的長谷川被囑聘為總督府鐵道顧問，每年津貼2,000圓，結束該職的時間不詳。<sup>88</sup>至於受後藤重用的新渡戶稻造(1862-1933)，1904年辭去臨時臺灣糖務局長，轉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後，仍受到總督府的委託。<sup>89</sup>但新

<sup>83</sup> 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險」之展開〉，收入黃富三等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29-30。

<sup>84</sup> 〈學務顧問〉，《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897年8月10日，2版；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頁44。

<sup>85</sup> 〈伊澤修二氏教育に關する上申〉，收入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委員會編，《後藤新平文書（微卷）》（東京：雄松堂，1979），R32。此為伊澤第四次來臺，其自1895年至1916年間總共來臺7次。參見木下知威編，《伊澤修二と臺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頁10-15。

<sup>86</sup> 「學務顧問伊澤修二御用濟二付顧問ヲ解ク」（1898.6），典藏號：00000334011。在《樂石自傳教界周遊前記》與《樂石伊澤修二先生》的年譜，都未記載伊澤何時解除學務顧問職。參見伊澤修二君還曆祝賀會編，《樂石自傳教界周遊前記》（東京：伊澤修二君還曆祝賀會，1912），頁296；故伊澤先生記念事業會編纂委員編纂，《樂石伊澤修二先生》（東京：故伊澤先生記念事業會，1919），頁354。

<sup>87</sup> 長谷川在臺時期的事蹟，參見蔡龍保，〈長谷川謹介與日治時期臺灣鐵路的發展〉，《國史館學術集刊》，6（臺北，2005.9），頁61-108。

<sup>88</sup> 「長谷川謹介鐵道顧問囑託ノ件」（1908.12），典藏號：00001429025。

<sup>89</sup> 吳文星，〈新渡戶稻造與日本治臺之宣傳〉，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日據時期臺灣使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93），頁34-35。由現存的《總督府公文類纂》可知，新渡戶於擔任京都帝大法科大學教授時曾受臨時臺灣糖務局委託（1904年7月），1910年代也曾被總督府委託殖產相關事務，但無直接資料顯示其為總督府顧問。

渡戶並非總督府顧問。

在這少數的日本人顧問中，後藤是唯一在勅令公布後正式擔任總督府顧問者。勅令第242號內容原文翻譯如下：

第一條，臺灣總督府及關東都督府，各得置顧問一人。第二條，凡屬臺灣總督府或關東都督府所管之行政事務所關，顧問須應臺灣總督或關東都督之諮詢，開陳意見。第三條，顧問在臺灣總督府，依內務大臣之奏請，在關東都督府，則依外務大臣之奏請，而皆在內閣命之。<sup>90</sup>

日本國內的媒體對於何人出任總督府顧問有所議論，亦有反對設置顧問之意見。對此，9月8日《臺日》評謂：

熟讀以上三個條，則對督府之權力別無何等之掣肘，不過總督或都督有必要之時，徵顧問之意見而已；是顧問純然顧問也，純然諮詢機關也。彼反對之者，不在於此敕令之規定，似在於他日發表之顧問，其人之位置。蓋聞南滿洲鐵道會社總裁，將使兼關東都督顧問之說，極口痛論，謂被監督者不可兼為監督者。雖然，是之議論亦不得謂為有理由，如敕令所規定，則顧問純然顧問，純然為諮詢機關，與都督之監督權毫不相干涉。若夫顧問其人之稱職與否，諒世間自有定評。<sup>91</sup>

強調顧問係被動接受徵詢，不會發生越權問題，且人選公布後，各界自然可以理解，並斷言東京方面的主要媒體無論贊成或反對顧問制度，都是意在都督府之顧問，「臺灣總督府之顧問，似絕

<sup>90</sup> 〈兩督府顧問設置勅令〉，《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9月15日，1版。該報9月8日刊登之〈兩督府顧問々題〉，以及《臺灣協會會報》也可見漢文翻譯，在此引用文字較為通順的9月15日報社刊登之漢文翻譯，參見〈兩督府顧問々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9月8日，2版；〈總督府都督府之顧問〉，《臺灣協會會報》，96（東京，1906.9），頁44-45。

<sup>91</sup> 〈兩督府顧問々題〉，2版。

無何等之言也」。<sup>92</sup>

上述勅令公布後，9月10日，臺灣總督稟請內務大臣任命後藤為該府顧問，於11月13日發令。<sup>93</sup>期間發生的問題，前已詳述。另一方面，9月初總督府立案「臺灣總督府諮詢規程」（內訓第20號），最初的文字與最終的版本（11月）略有出入，例如：第一條第一項「關於官廳的組織及權限之重要事項」改為「關於本島統治組織變更之事項」，但整體的精神不變。該諮詢規程之內容翻譯如下：

第一條，諮詢顧問之事項如下：一，關於本島統治組織變更之事項；二，關於重要事業的企劃及中止或廢止之事項；三，關於預算之事項；四，其他對統治上特別重要之事項。

第二條，為掌理與諮詢相關事務，總督府內設置顧問主事，由秘書官擔任。<sup>94</sup>

11月26日，後藤收到佐久間總督的內訓後，發電報表示希望由齋藤參吉秘書官擔任顧問主事。於是翌日總督府任命齋藤擔任該職。<sup>95</sup>

有時論指出，顧問制度的關鍵在於總督，蓋在臺灣享領高薪又能指揮眾多人員的總督，若仍有賴顧問發揮手腕，則顧問可說是必不可缺的角色；反之若施政成績頗佳，那麼顧問的存在，不啻政府對外證實行政機關確有冗員甚多之現象。<sup>96</sup>關於後藤顧問為

<sup>92</sup> 〈兩督府顧問々題〉，2版。

<sup>93</sup> 「後藤民政長官敘勳及南滿洲鐵道會社總裁並臺灣總督府顧問等仰付ラレノ件」（1906.9），典藏號：00001237061。

<sup>94</sup> 「內訓第二十號臺灣總督府諮詢規程」（1906.9），典藏號：00001155003；〈臺灣顧問の權能〉，《臺灣協會會報》，99（東京，1906.12），頁20。

<sup>95</sup> 「秘書官齋藤參吉ニ總督府顧問主事ヲ命スル件」（1906.11），典藏號：00001238030；〈敘令及辭令〉，《府報》（臺北），第2087號，1906年11月30日，頁58；〈兩督府之主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12月1日，2版。

<sup>96</sup> 〈臺灣通信（其一）〉，《日本辯護士協會錄事》，101（東京，1906.9），頁124。

總督府做出的貢獻，報紙偶有報導，例如：1906年11月，報載預定來年舉辦的東京勸業博覽會將建設臺灣館：

總督府經函致該會，謂欲在會場內建設臺灣館，以紹介臺灣產物於世，該會欣然許諾。然該會場擬設於上野公園，現正行整頓，其規模嫌不闊大，已於不忍池畔馬見場舊址設第二會場，而於是處設機械館及外國館。即此以觀，是欲於既定之會場內建設臺灣館，已無餘地。……後藤顧問與東京府交涉，已請得臺灣館用地一百四十坪云。<sup>97</sup>

當時新任長官祝辰巳還在國外，來不及處理此事，於是由後藤顧問幫忙，此即1907年東京勸業博覽會臺灣館設置於第二會場之由來。<sup>98</sup>

為具體考察總督府顧問制度的運作情形，筆者利用《後藤新平文書》保留的「秘顧問關係覺書」（按：「覺書」為備忘之意）進行分析。其中有關臺灣的部分，主要收錄1906年12月至1907年8月間後藤與祝辰巳等人往來的電報，以及祝與總督府官員大津麟平（1865-1939）等人之間的電報。內容涵蓋的主題包括：後壁林地方土地收購成績良好、三美路商會密契爾（Sir William Foot Mitchell, 1859-1947）因對樟腦專賣制度有功獲總督上奏而得到敘勳與賜章、<sup>99</sup>收購大稻埕德國領事館的時機及其用途、鹽水港製糖會社擴張問題、各製糖會社所需土地之位置、大嵙崁開墾地與三井之利益、大嵙崁方面的隘勇線順利連結深坑廳下的隘勇線，<sup>100</sup>以及各種人

<sup>97</sup> 〈建設臺灣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11月29日，2版。

<sup>98</sup> 該會舉辦經過及臺灣館之特色，參見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2011），頁160-168。

<sup>99</sup> 1896年三美路商會獲得供應鴉片原料給總督府製藥所的特權，其後又包辦粗製樟腦對外的總經銷權（1900年至1908年獨佔該項利益）。日本政府為表揚三美路商會的貢獻，特授勳予威廉密契爾（Sir William Foot Mitchell）。參見鍾淑敏，〈英商三美路商會（Samuel Samuel & Co., Ltd.）與日治前期臺灣的產業發展〉，《臺灣史研究》，25：2（臺北，2018.6），頁97-143。

<sup>100</sup> 電報以外，1907年6月，祝辰巳也以書信向後藤顧問報告桃園廳與深坑廳間的隘勇線進展情況，以及說明死傷多數的原因除了地形不利外，在於原住民「決死的反

事問題，包括：淺田知定（1862-1926）辭官投入製糖會社經營、佐藤源平轉任朝鮮、<sup>101</sup>小野木孝治（1874-1932）技師的後任確定前陸軍兼勤的技師暫時從缺、後藤對臺北醫院長表示該院岸一太（1875-1937，時任總督府醫院醫長兼醫學校教授）的後任人選宜遵從民政長官指示辦理、尾立維孝（1860-1927）續留臺灣任職、後藤希望總督府儘速命令小泉政明到大連出差、總督府覆審法院長鈴木宗言（1863-1927）之後任問題、臺北廳長佐藤友熊（1866-1923）轉任都督府事務官、彰化廳長加藤尚志轉任臺北廳長、典獄長小松吉久（1867-?）轉任彰化廳長等。<sup>102</sup>限於篇幅，以下僅就淺田知定進入東洋製糖之經緯，以及法界的人事異動加以探討，由此了解後藤顧問扮演之角色。

東洋製糖會社成立於 1907 年，位在嘉義廳下。<sup>103</sup>其背景是日俄戰爭（1904-1905）結束後，日本內地資金大舉投入臺灣的製糖業，出現新設製糖會社的熱潮，進而衍生各家製糖公司間的整併現象。<sup>104</sup>各公司為妥善經營起見，必須強化陣容，而任職臨時臺灣糖務局的淺田，參與原料採取區域的劃定，熟稔臺灣糖業，自

---

抗」所致。當時從臺北寄出，約一週後可送達大連。參見〈後藤新平關係文書Ⅱ〉，收入檜山幸夫、東山京子編，《台灣近代史料研究·第2號》（名古屋：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台灣總督府文書目錄編纂室，2005），頁99-102。

<sup>101</sup> 文書中提到，1906年12月後藤發電報給祝辰巳，希望任職淡水稅關的佐藤源平於轉任朝鮮前，總督府先讓他昇為高等官。不過，佐藤並未轉任。

<sup>102</sup> 〈秘 顧問關係覺書〉，收入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委員會編，《後藤新平文書（微卷）》（東京：雄松堂，1979），R33。從這份資料可見的印章判斷，負責整理電報的是增田，即增田次郎。增田原為總督府府屬，隨後藤前往滿洲，再隨後藤回到東京，1910年代以後曾當選一次眾議院議員（1915年），歷任大同電力株式會社等多間公司的高層，1941年11月被總督府任命為臺灣電力株式會社長，是位頗富傳奇性的人物。參見「總督府屬增田次郎鐵道院書記二任用ノ件」（1908.12），典藏號：00001555004；「增田次郎（命府評議員）」（1941.12），典藏號：00010116b36。

<sup>103</sup> 該社創業初期的情形，參見《臨時臺灣糖務局第六年報（明治四十年度）》（臺北：臨時臺灣糖務局，1908），頁351-360。

<sup>104</sup> 黃紹恆，《砂糖之島：日治初期的臺灣糖業史1895-1911》（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頁234-255。

是業界期待的人選。<sup>105</sup>根據「秘 顧問關係覺書」的電報資料可知，1906年12月，祝長官向後藤顧問報告，關於淺田進入東洋製糖會社一事已與淺田談過，不過淺田對事業的前景有所疑慮，經力勸淺田深思後，看來已下定決心，但前提是淺田要和公司大股東們先行協議才能確定結果，已請淺田近日搭船上京處理此事。後藤則認為要淺田放棄已有相當地位的官職，轉而投入將來未知成功可否的事業，實有必要提示淺田相應的待遇。後藤的想法，是對淺田保證在公司任職三年或五年後可獲得50,000圓，即使中途離職，只要沒有失職亦可獲得30,000圓。後藤表示，如果祝同意此一辦法可行，煩請向公司提出上述條件，公司做出決定後，相信淺田不會再猶豫，必將全力以赴。對後藤顧問提出的建議，祝辰巳卻認為，關於成功謝金的約定，由於在臺灣經營事業，不免有預想外的困難，到底在事業經營上要讓淺田負多大的責任，今後是一個大問題；其次，目前有好幾間大公司同時競爭，可預期會發生諸多難題，公司大股東們對此有何想法，凡此都必須做通盤的考量。<sup>106</sup>

1907年1月，祝辰巳向總督報告淺田確定進入東洋製糖會社，將命其休職；2月7日，淺田的休職獲得認可。<sup>107</sup>淺田在4月10日提出的辭呈中，說明數年前罹患瘧疾，近來每日發作，全身衰弱疲勞，就連日常私事也難以應付，經醫師診斷，已由主治醫中川幸庵與臺南醫院長松尾知明開立證明，擬以二到三年專心療養。翌月，淺田獲免去其本兼各官。總督府以其自1900年擔任澎湖廳長，不久兼任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事務官，而自1902年臨時臺灣

---

<sup>105</sup> 杉野嘉助編纂，《臺灣糖業年鑑》（臺北：臺灣通信社，1927），〈新高の経営振と故淺田知定君〉，頁355。淺田辭官後，先後任職於東洋製糖、新高製糖。參見〈故淺田氏略歷〉，《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年10月26日，3版；〈故淺田知定位階追陞ノ件〉，大正15年10月（1926.10），收入《叙位裁可書》（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檔號：A11113672400。

<sup>106</sup> 〈秘 顧問關係覺書〉，收入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委員會編，《後藤新平文書（微卷）》，R33。

<sup>107</sup> 「淺田知定昇級ノ件」（1907.1），典藏號：00001330011；「淺田知定休職命令」（1907.2），典藏號：00001330056。

糖務局成立後又任該局事務官，1903年起又兼總督府事務官，勤於職務，績效卓著，故給予獎金400圓。<sup>108</sup>積勞成疾而不堪任職等因素，為總督府檔案中常見用來辭職的理由，不可盡信。由上可見後藤顧問為祝長官出主意，秉持其一貫的原則和風格，即用人不惜成本，方能使才為己用。當然此是為了替東洋製糖著想，雖說也不無干涉東洋製糖的用人之嫌，但正因官商間緊密的關係，以及製糖公司有必要借助總督府官員的經驗與人脈，此種近乎交易的對話才會如實地呈現在電報中。相對於後藤豪放的性格，祝可謂以專業官僚的角度辦事，符合後人對祝的評價，略謂：雖然不如後藤之長於「奇謀妙策」，惟就「警捷敏明」或「敏捷俊邁」這點而言，則無人能比。<sup>109</sup>新舊任長官的個性確實迥然有別。

其次，針對後藤顧問與祝長官處理的法界人事異動加以探討。後藤辭職前曾考慮幾項人事異動，包括鈴木宗言從總督府覆審法院長改為司法省民刑局長、尾立維孝從總督府覆審法院檢察官長改為控訴院檢事長或使其休職、中村是公（1867-1927）改為關東州民政長官、祝辰巳改為總督府民政長官、長谷川謹介改為滿鐵技師長。<sup>110</sup>如其所願的只有祝順利銜接後藤擔任民政長官。中村於1906年11月擔任總督府財務局長兼總務局長時被任命為滿鐵副總裁（之後擔任都督府民政長官），<sup>111</sup>長谷川則是擔任鐵道院東部管理局長，已如前述。至於尾立，1906年12月，祝向後藤報告尾立有意繼續在臺灣任職，總督也同意，故後藤替尾立所安排

---

<sup>108</sup> 「淺田知定休職命令」（1907.1），典藏號：00001330065；「糖務局事務官淺田知定依願免官」（1907.4），典藏號：00001335025。

<sup>109</sup> 橋本白水，《評論臺灣之官民》（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24），頁30；橋本白水，《臺灣的事業界と人物》（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28），頁316-317。

<sup>110</sup> 王鈇軍，〈台灣總督府官僚と関東都督府の設立—植民地間の官僚交流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檜山幸夫編，《帝国日本の展開と台湾》（東京：創泉堂，2011），頁207。

<sup>111</sup> 「總務局長中村是公南滿鐵道會社副總裁仰付ラレ等ノ件」（1906.11），典藏號：00001238029。

的轉任請作罷論，對此後藤表示了解。<sup>112</sup>尾立在總督府又工作了三年，1909年11月被命休職，理由是身體生病、短期內無恢復之可能性。<sup>113</sup>11月初，在鐵道飯店舉辦官民送別會後，尾立搭船返日；其後任由手島兵次郎（1868-1918）法務課長擔當。<sup>114</sup>尾立結束自1899年底以來在臺灣法界的生涯，1911年因休職期滿而退官。<sup>115</sup>

至於鈴木宗言的出路，根據「秘 顧問關係覺書」的電報資料可知，1907年6月，祝向後藤報告鈴木覆審法院長的後繼人選。雖然後藤提及寺島小五郎（1864-1930）可以考慮，但是祝認為寺島的性格「氣量狹小」，與部下相處不甚融洽，而且作為法律家所能發揮的功能不及鈴木，甚至謂寺島有今日之地位全是在臺灣獲得，內地司法界幾乎都不太認識他，如用此人不僅降低該院長的地位，未來採用內地的司法官時恐將發生問題，故建議改聘橫濱地方裁判所長石井常英（1864-1917），已請大津麟平探詢石井的意願。祝也建議讓鈴木昇為高等官一等，理由是鈴木轉任內地時如果仍為高等官二等，官等反不如其過去在日本的部下，則鈴木來臺任職竟因此而蒙受不利，結果將令人感到遺憾。對於祝有關鈴木後繼人選與升等問題的兩點建議，後藤都表示同意。<sup>116</sup>可見總督府何等重視院長人選，蓋其牽涉將來延攬日本內地法界人才，不可不慎。

有關覆審法院長的人事問題，「秘 顧問關係覺書」資料只有祝長官和後藤顧問間的對話片段，更詳細的內容保留在總督府檔案中。根據分析檔案可知，祝雖然認為寺島任職頗為勤勞誠實，

---

<sup>112</sup> 〈秘 顧問關係覺書〉，收入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委員會編，《後藤新平文書（微卷）》，R33。

<sup>113</sup> 「檢察官尾立維孝休職」（1909.11），典藏號：00001553005。

<sup>114</sup> 〈尾立覆審法院檢察官長の退職〉，《法院月報》，3：12（臺北，1909.12），頁274-275。

<sup>115</sup> 「尾立維孝恩給下賜上申及同證書送付」（1912.2），典藏號：00001913018；〈尾立維孝氏東京で永眠〉，《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7年6月29日，1版。

<sup>116</sup> 〈秘 顧問關係覺書〉，收入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委員會編，《後藤新平文書（微卷）》，R33。

此點人所皆知，但因寺島的性格使然，判官們與辯護士（律師）們都對寺島不服。於是祝請司法省當局「割愛」，務必讓石井來臺任職，並請該省安排讓寺島擔任內地的地方裁判所長。而在大津與司法省的交涉過程中，後藤顧問儘管公務繁忙，也居中幫忙，使鈴木順利於7月昇為高等官一等。<sup>117</sup>1907年9月，寺島卸任臺北地方法院長，轉任高知地方裁判所長。<sup>118</sup>鈴木的後任確定由石井來接。<sup>119</sup>鈴木從總督府覆審法院長轉任大審院檢事，<sup>120</sup>此一結果雖不符後藤原本規劃的轉任司法省民刑局長，但在祝與後藤的努力下，鈴木順利獲得升等。

上述可見，在六三法體制下，總督擁有行政、立法及司法權，但至少從本例可觀察到民政長官在法界人事方面扮演的角色。進而言之，總督府高層在考量人事問題時，基於制度規定依法行政以外，當事者的能力與性格也是決定人選的重要依據。而為回饋來臺任職者，在其轉任內地之際給予特別的優待，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這些原本可能只會透過口頭討論的內心話，正是因為顧問制度的關係，新舊民政長官即使遠隔兩地，藉由電報傳遞訊息，在公文書中留下文字紀錄，讓人事決策的多幕場景得以再現，使吾人可一窺人事案件最深奧的部分。

1907年8月以後祝與後藤往來的電報情形，尚未得見具體的資料。目前僅知兩人也以書信聯繫，信中包含的訊息量頗多，使後藤能掌握臺灣的近況。<sup>121</sup>同樣有待探究的，是顧問主事齋藤參吉

<sup>117</sup> 「法院判官鈴木宗言昇等」（1907.6），典藏號：00001339019。

<sup>118</sup> 「判官寺島小五郎判事二轉任」（1907.8），典藏號：00001342036；〈寺島前地方法院長送別會〉，《法院月報》，1：5（臺北，1907.10），頁8-9。

<sup>119</sup> 〈石井新院長の歡迎及披露〉，《法院月報》，1：5（臺北，1907.10），頁7。

<sup>120</sup> 〈鈴木前覆審法院長略歷〉，《法院月報》，1：1（臺北，1907.6），無頁碼。關於日治初期（1896-1909）總督府法院的人事構成、判官與檢察官異動情形，包含其數量的變化及具體的名單，參見岡本真希子，〈殖民地統治初期における台湾總督府法院の人事—判官・檢察官の任用狀況と流動性を中心に—〉，《社会科学》，48：2（京都，2018.8），頁239-275。

<sup>121</sup> 例如，1907年7月祝寫信向後藤報告以下幾件：蕃薯寮水力電氣工程已與大倉組協定，表面上為特許事業，實際上則視總督府財政情況再從大倉組買收回來；村橋素吉工學士赴美後曾二度來信，附上其複寫供後藤過目；柳本通義恆春廳長退

與後藤的互動關係。從1907年11月北埔事件發生後，18日，齋藤迅速彙整「隘勇反亂事件」的動態提供後藤過目，<sup>122</sup>可知齋藤平常應該也傳達不少臺灣訊息給後藤顧問。

1908年5月，祝辰巳去世，享年41歲。後藤在墓誌銘中謂其「獎殖產興業，榘樟腦煙鹽，治績大舉，臺灣財政有今日，其功居多矣」。<sup>123</sup>肯定祝是總督府達成財政獨立的功臣。<sup>124</sup>總督府有鑑於祝自1896年來臺後的貢獻，特撥款獎賞5,000圓。<sup>125</sup>關於新任長官的人選，佐久間總督有意起用時任總督府警視總長等職務的大島久滿次（1865-1918），在立案的過程中向桂太郎侯爵、寺內陸相、原敬內相報告其意中人選，也將此決定用電報通知後藤顧問，並問是否有意見。<sup>126</sup>當時後藤在國外考察中，據說頗為不悅。<sup>127</sup>同月28日，祝的靈柩從東京本鄉自宅被送至增上寺，其家人以外，大島民政長官代替總督參加，另有總督府關係者數名徒步以送，「寺內陸相、原內相、松田藏相、千家法相，及朝野名

---

職，後任為松崎省吾；岡田信興嘉義廳長退職，後任為北原種忠；關於板橋林本源家的家政，第三房提出決算書與財產目錄，據此對可分配者及可作為林家共有財產者進行整理，以便三房都接受的合約書能開始實行，已於本月在林家關係者及佐藤友熊臺北廳長、柳生一義臺銀頭取、生沼永保辯護士會同下協定完成，並附財產目錄的總括供後藤過目。由此信亦可知，林家的田園加上在華南的現金、不動產及債權，合計約1,000萬圓。同年9月，祝寫信報告有關臺灣日日新報社的株券（股票）債務相關事宜。參見〈後藤新平關係文書Ⅱ〉，收入檜山幸夫、東山京子編，《台灣近代史料研究·第2號》，頁103-110。

<sup>122</sup> 〈北埔事件〉，收入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委員會編，《後藤新平文書（微卷）》（東京：雄松堂，1979），R30。

<sup>123</sup> 〈祝辰巳氏墓誌銘〉，收入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委員會編，《後藤新平文書（微卷）》（東京：雄松堂，1979），R36。該墓誌銘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參見〈故祝民政長官墓誌銘〉，《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8年6月5日，3版。

<sup>124</sup> 有關總督府透過各項財政改革，藉此達成財政獨立（1905年），並促進產業經濟的近代化，參見林文凱，〈臺灣「中央財政」體制的轉型：日治初期（1898-1905）後藤新平總督府財政改革之歷史意義〉，《中央大學人文學報》，63（桃園，2017.4），頁1-44。

<sup>125</sup> 「民政長官祝辰巳賞與ノ件」（1908.5），典藏號：00001422046。

<sup>126</sup> 「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民政長官二任用ノ件」（1908.5），典藏號：00001422048。

<sup>127</sup> 財團法人臺灣救濟團編，《佐久間左馬太》，頁823。

士數百名，濟濟會葬」。<sup>128</sup>祝的葬儀結束後，6月，大島長官請示總督，表示在東京仍有事情未處理完畢，且後藤顧問預計於6月14日返回日本，擬與其見面後搭18日出發的船返臺。對此請求，總督指示可延後回府。<sup>129</sup>大島與後藤之間的互動仍不明瞭，但可以確定的是，大島就任後不久，便無需再在制度上接受後藤顧問的指導。

在此之前，約1908年3月，後藤遞出兩府顧問的辭呈，但西園寺首相不准。西園寺寫信告訴後藤，關於辭職的時機，必須與閣員討論過後才能決定，且聽說關東都督近日將上京，故暫時先保留辭呈。<sup>130</sup>後藤又拜訪西園寺，請求解除顧問職。後藤在「臺灣總督府關東都督府顧問制度停廢之議」中，指出兩府於1906年設置顧問乃因預想兩地在施政上會有所不便，而設計出此一權宜制度，「爾來臺灣行政狀況在新任總督與民政長官施政經營得宜下，已無顧問參與之必要，而在關東都督府方面，由於其民政長官可兼滿鐵副總裁，都督府行政與滿洲殖民機關間具有調和溝通管道，現行的顧問制度委實沒有必要再加以維持」。<sup>131</sup>儘管西園寺慰留，後藤不願擔任顧問的消息還是傳開，不久《臺日》即報導：「後藤總裁近因事務多忙，將欲辭臺灣總督府顧問之任，已將其意微漏於近親者，不遠將見諸事實。此係《萬朝報》所揭之事，但吾儕未容易信有此事而已矣。」<sup>132</sup>後藤辭職不成，但已無心眷戀此職，1908年7月，第二次桂內閣成立前，素與後藤關係密

<sup>128</sup> 〈補錄祝方伯葬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8年6月7日，5版。

<sup>129</sup> 「民政長官大島久滿次後藤顧問へ面接ノ上歸府ノ件」（1908.6），典藏號：00001423001。

<sup>130</sup> 立命館大学西園寺公望伝編纂委員会編，《西園寺公望伝・別卷1》，頁96。

<sup>131</sup> 鶴見祐輔著，一海知義校訂，《正伝・後藤新平4滿鉄時代1906~08年》，頁630-631。文中提及的民政長官可兼滿鐵副總裁，指的是中村是公；1906年11月，中村被內閣任命為滿鐵副總裁，1907年4月，辭滿鐵副總裁並轉任都督府民政長官，翌月開始同時處理滿鐵副總裁職務，輪流在都督府（旅順）與滿鐵（大連）上班。1908年5月回任滿鐵副總裁，同年12月擔任總裁（直到1913年12月）。參見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頁55；〈中村是公氏履歷書〉，收入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委員會編，《後藤新平文書（微卷）》（東京：雄松堂，1979），R36。

<sup>132</sup> 〈顧問辭任〉，《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8年4月19日，1版。

切的杉山茂丸（1864-1935）專程趕往大連會見後藤，向其傳達中央政府的意向，且力說「此際斷然辭去都督府顧問，實為上策」，據云得到後藤的允諾。<sup>133</sup>

1908年7月，桂太郎二度組閣，後藤入閣擔任遞信大臣，在宮中的位序享有親任官待遇。<sup>134</sup>此時有關後藤擔任總督府顧問的問題，中央政府與總督府間有多次電報往來，內容可歸納如下。首先，內務次官通知總督府，後藤將被免去其所兼顧問一職。對此，佐久間總督在7月21日發給內務大臣平田東助（1849-1925）的電報中，表明希望繼續請後藤擔任顧問。平田則向佐久間表示，後藤入閣後可繼續參與臺灣施政，但實無兼任顧問之必要，且兼任顧問亦有失妥當。23日，事情出現轉折，佐久間認為既然首相與內相主張後藤辭去顧問，轉而同意中央政府的安排，惟希望後藤今後雖無顧問之名，盼仍繼續指導臺政；並藉此機會感謝後藤歷來鼎力相助，臺灣統治才能免於產生重大疏失。至於後藤本人的意願，總督府檔案中保存有一張紙片，寫著上回總督來東京時（推測是1907年底），辭去顧問的事已經獲得總督承認，懇請總督容許其辭退顧問。顯然的，後藤認為此事早已得到允諾，辭意甚堅。待後藤辭去都督府與總督府的顧問後，兩府針對該給予後藤多少慰勞賞金，都督府秘書官高橋本吉（1873-1920）與總督府秘書官齋藤參吉進行討論；都督府原擬給予慰勞獎金 2,000 圓及價值約千圓的紀念品，結果是各出 5,000 圓（總督府自始即主張 5,000 圓），合計 10,000 圓。<sup>135</sup>7月24日，後藤被免去顧問職，擔任顧問的時間不滿兩年。<sup>136</sup>

《臺日》社論對後藤辭去顧問的意義進行解說，指出在官制上，總督府的中央主管機關為內務省，後藤遞相若兼內務省所管的總督府之顧問，顯然不妥；而在都督府方面，該府由外務省所

<sup>133</sup>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三卷》（東京：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會，1937），頁23。

<sup>134</sup> 〈官廷位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8年7月28日，1版。

<sup>135</sup> 「顧問後藤新平免職二關スル賞與一件」（1908.7），典藏號：00001428055。

<sup>136</sup> 〈敕令及辭令〉，《府報》（臺北），第2487號，1908年7月28日，頁69。

管，滿鐵則已改歸遞信省所管，身為遞相的後藤自無法再擔任都督府顧問。並強調後藤辭去顧問只是形式而已，實質上其現居國務大臣之要津，必定比擔任顧問更加對臺灣有利。<sup>137</sup>

1908年11月，大島都督與佐久間總督同步向內閣稟請賞與後藤，兩府提出的理由相似，皆謂後藤於擔任顧問期間經常參與樞機、回答重要案件之諮詢，功勞不少，請給予其賞與金5,000圓；11月24日獲得內閣認可。<sup>138</sup>賞金以外，後藤獲得下賜金杯一組。<sup>139</sup>這份有關後藤辭去總督府顧問的檔案提到：1907年，總督府內部曾討論要付給後藤顧問一年2,000圓的津貼，後藤加以辭退。其理由不詳，或許滿鐵總裁的高薪讓後藤在金錢方面無後顧之憂，<sup>140</sup>也或許為免落人口實。因缺乏直接的史料可資佐證，有待檢證。

1910年5月，法制局立案廢止1906年公布之勅令第242號，此案經內閣會議認可，天皇加以裁可、公布（6月21日），是為勅令第286號。總督府的顧問制度於此畫下句點。<sup>141</sup>

<sup>137</sup> 〈後藤男の顧問辭任〉，《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8年7月26日，2版。

<sup>138</sup> 〈元關東都督府顧問元台灣總督府顧問男爵後藤新平〉，明治41年11月（1908.11），收入《公文類聚》（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檔號：A04010156300。

<sup>139</sup> 「顧問後藤新平免職ニ關スル賞與一件」（1908.7），典藏號：00001428055。

<sup>140</sup> 關於滿鐵高層的薪資，據報載可知，「總裁係年俸五萬圓，副總裁三萬圓，理事一萬二千圓」。參見〈南滿鐵道重役之俸給〉，《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12月26日，1版。

<sup>141</sup> 〈明治三十九年勅令第二百四十二号・（台湾總督府及關東都督府ニ顧問ヲ置クノ件）・ヲ廢止ス〉，明治43年5月（1910.5），收入《公文類聚》（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檔號：A01200052100；〈御署名原本・明治四十三年・勅令第二百八十六号・明治三十九年勅令第二百四十二号（台湾總督府及關東都督府ニ顧問設置ノ件）廢止〉，明治43年6月（1910.5），收入《御署名原本（明治）》（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檔號：A03020859900；〈勅令〉，《官報》（東京），第8099號，1910年6月22日，頁499；〈勅令抄錄〉，《府報》（臺北），第2992號，1910年6月30日，頁93-94。

## 四、結論

本文考察 1906 年後藤新平卸任總督府民政長官後兼任總督府顧問之經緯，並對其如何指導總督府官僚進行個案分析，加深對此一時期總督府人事運作的認識。

該年總督更迭，兒玉源太郎總督轉任參謀總長，佐久間左馬太繼任第五任總督，亟需擁有豐富治理經驗的後藤從旁輔佐，但在中央政府力邀後藤擔任滿鐵總裁後，佐久間儘管感到遺憾，對此並不反對。後藤對新職的安排，原先的態度是拒絕，經與多位高層密集交涉後，轉而主動開出就任條件，其一即是兼任關東都督府顧問，目的在使滿鐵與該府保持聯繫。雖然外相林董等人抱持反對意見，但在首相西園寺公望、陸相寺內正毅及內相原敬的通力協調下，發布勅令確立都督府與總督府的顧問制度。在後藤與中央政府交涉的過程中，兼任總督府顧問的必要性較少受到質疑，政府高層認為仍有必要讓後藤繼續參與臺灣政務，後藤也可藉此延續影響力。然而後藤在處理兼任總督府顧問的問題時，操之過急，竟對陸相打電報表示總督反對該制度，致使陸軍長老的山縣有朋元帥出面關心此案，後藤此舉引起總督不悅。顧問制度不是總督府主動設計，而是中央的政治過程產生之特殊結果。從目前得見的資料可知，制度上雖然規定顧問應總督之諮詢，實際上與後藤顧問電報往來的是新任民政長官祝辰巳等人；後藤並非顧而不問，其時而指導後進辦事，意見獲得尊重，但祝辰巳也不全然聽命行事，而是綜合考量後作出判斷，基本上後藤也都支持他們的決定。後藤擔任總督府顧問幾個月後，或因放心總督府有其以前的部屬接棒施政，加以滿鐵方面業務日益繁重，而萌生辭去顧問的念頭，直到 1908 年夏入閣後順利辭職。由於無人可取代後藤在臺灣的地位，中央政府與總督府未根據勅令任命第二位總督府顧問；法制局可能鑑於此一專為後藤量身打造的顧問制度不再發揮作用，於 1910 年立案廢止勅令。

此一時期日本政治家利用電報和書信作為溝通工具，故要深入解析總督府的政治史，不能忽略解讀私人文件中的訊息，唯有

周延地掌握多層次的史料，總督府的運作情形才能更立體地被描繪出來。今後在此基礎上，筆者將繼續探究後藤勢力興衰的歷史以及詮釋其所反映的意義。

（責任編輯：王亭方 校對：洪慈惠）

## 引用書目

### 一、史料

#### (一) 檔案、史料彙編

#### 1. 《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

- 「內訓第二十號臺灣總督府諮詢規程」(1906.9)，〈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155003。
- 「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衛生顧問囑託ヲ解ク」(1898.3)，〈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甲種永久保存進退追加第一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0332054。
- 「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民政長官ニ任用ノ件」(1908.5)，〈明治四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高)第五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422048。
- 「元民政長官男爵後藤新平ニ恩給下賜ノ儀上申該證書交付ノ件」(1907.2)，〈明治四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273002。
- 「顧問後藤新平免職ニ關スル賞與一件」(1908.7)，〈明治四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高)第十一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428055。
- 「後藤新平衛生顧問囑託ノ件」(1896.4)，〈明治二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追加第一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0119021。
- 「後藤民政長官敍勳及南滿洲鐵道會社總裁並臺灣總督府顧問等仰付ラレ

- ノ件」(1906.9)，〈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十六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237061。
- 「長谷川謹介鐵道顧問囑託ノ件」(1908.12)，〈明治四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高)第十二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429025。
- 「糖務局事務官淺田知定依願免官」(1907.4)，〈明治四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六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335025。
- 「判官寺島小五郎判事ニ轉任」(1907.8)，〈明治四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十三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342036。
- 「秘書官齊藤參吉ニ總督府顧問主事ヲ命スル件」(1906.11)，〈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十七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238030。
- 「尾立維孝恩給下賜上申及同證書送付」(1912.2)，〈大正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913018。
- 「法院判官鈴木宗言昇等」(1907.6)，〈明治四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十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339019。
- 「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依願免官殖產局長祝辰巳民政長官ニ任用ノ件」(1906.9)，〈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十六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237062。
- 「民政長官交迭ノ旨陸海軍幕僚へ通知ノ件」(1906.11)，〈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十六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

00001237066。

- 「民政長官祝辰巳賞與ノ件」(1908.5)，〈明治四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高)第五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422046。
- 「民政長官大島久滿次後藤顧問へ面接ノ上歸府ノ件」(1908.6)，〈明治四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高)第六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423001。
- 「兒玉總督子爵ヲ後藤長官男爵ヲ授ケラレ兒玉總督參謀總長ニ佐久間大將臺灣總督ニ任セラレ祝電及各官衙ニ通知ノ件」(1906.4)，〈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六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227053。
- 「學務顧問伊澤修二御用濟ニ付顧問ヲ解ク」(1898.6)，〈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甲種永久保存進退追加第三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0334011。
- 「檢察官尾立維孝休職」(1909.11)，〈明治四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高)第十一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553005。
- 「淺田知定休職命令」(1907.1)，〈明治四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一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330065。
- 「淺田知定休職命令」(1907.2)，〈明治四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一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330056。
- 「淺田知定昇級ノ件」(1907.1)，〈明治四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一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1330011。

- 「總督府屬增田次郎鐵道院書記ニ任用ノ件」(1908.12)，〈明治四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一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555004。
- 「總務局長中村是公南滿鐵道會社副總裁仰付ラレ等ノ件」(1906.11)，〈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十七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238029。
- 「增田次郎(命府評議會員)」(1941.12)，〈昭和十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退原議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116b36。

## 2.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検索系統

- 〈元関東都督府顧問元台湾総督府顧問男爵後藤新平〉，明治 41 年 11 月 (1908.11)，收入《公文類聚》，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檔號：A04010156300。
- 〈故浅田知定位階追陞ノ件〉，大正15年10月(1926.10)，收入《叙位裁可書》，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檔號：A11113672400。
- 〈御署名原本・明治三十九年・勅令第二百四十二号・臺灣総督府及関東都督府ニ顧問ヲ置クノ件〉，明治39年9月(1906.9)，收入《御署名原本(明治)》，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檔號：A03020684400。
- 〈御署名原本・明治四十三年・勅令第二百八十六号・明治三十九年勅令第二百四十二号(台湾総督府及関東都督府ニ顧問設置ノ件)廃止〉，明治43年6月(1910.5)，收入《御署名原本(明治)》，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檔號：A03020859900。
- 〈明治三十九年勅令第二百四十二号・(台湾総督府及関東都督府ニ顧問ヲ置クノ件)・ヲ廃止ス〉，明治43年5月(1910.5)，收入《公文類

聚》，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檔號：A01200052100。

〈臺灣總督府及関東都督府ニ顧問ヲ置ク〉，明治39年8月（1906.8），收入《公文類聚》，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檔號：A01200243500。

### 3. 《後藤新平文書（微卷）》

〈中村是公氏履歷書〉，收入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委員會編，《後藤新平文書（微卷）》，東京：雄松堂，1979，R36。

〈北埔事件〉，收入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委員會編，《後藤新平文書（微卷）》，東京：雄松堂，1979，R30。

〈伊澤修二氏教育に関する上申〉，收入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委員會編，《後藤新平文書（微卷）》，東京：雄松堂，1979，R32。

〈佐久間總督より接受したる電信〉，收入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委員會編，《後藤新平文書（微卷）》，東京：雄松堂，1979，R37。

〈祝辰巳氏墓誌銘〉，收入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委員會編，《後藤新平文書（微卷）》，東京：雄松堂，1979，R36。

〈秘顧問關係覺書〉，收入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委員會編，《後藤新平文書（微卷）》，東京：雄松堂，1979，R33。

### 4. 日記、傳記、回憶錄等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7。

立石駒吉，《後藤新平論集》，東京：伊藤元治郎發行，1911。

伊澤修二君還曆祝賀會編，《樂石自傳教界周遊前記》，東京：伊澤修二君還曆祝賀會，1912。

後藤新平，《日本植民政策一斑》，東京：拓殖新報社，1921。

故伊澤先生記念事業會編纂委員編纂，《樂石伊澤修二先生》，東京：故伊澤先生記念事業會，1919。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二卷》，東京：乾元社，1951。

財團法人臺灣救濟團編，《佐久間左馬太》，臺北：財團法人臺灣救濟團，1933。

橋本白水，《評論臺灣之官民》，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24。

橋本白水，《臺灣の事業界と人物》，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28。

橋本白水，《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30。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三卷》，東京：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會，1937。

鶴見祐輔著，一海知義校訂，《正伝・後藤新平 3 台灣時代 1898～1906 年》，東京：藤原書店，2005。

鶴見祐輔著，一海知義校訂，《正伝・後藤新平 4 滿鉄時代 1906～1908 年》，東京：藤原書店，2005。

## 5. 史料彙編

千葉功編，《桂太郎発書翰集》，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1。

立命館大学西園寺公望伝編纂委員会編，《西園寺公望伝・別卷 1 明治・大正期》，東京：岩波書店，1996。

尚友俱樂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編纂委員会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 2》，東京：山川出版社，2006。

尚友俱樂部児玉秀雄關係文書編集委員会編，《児玉秀雄關係文書 1》，東京：同成社，2010。

東亞同文會編，《續對支回顧録（下）》，東京：原書房，1981。

檜山幸夫、東山京子編，《台湾近代史料研究・第2號》，名古屋：中京大學社会科学研究所台湾総督府文書目錄編纂室，2005。

### （二）期刊、報紙、公報

《日本辯護士協會錄事》，東京，1906。

《官報》，東京，1906、1910。

《府報》，臺北，1906-1910。

《東京朝日新聞》，東京，1906。

《法院月報》，臺北，1906-1909。

《萬朝報》，東京，1906。

《滿蒙》，大連，1936。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1907。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897-1929。

《臺灣協會會報》，東京，1906。

《臺灣慣習記事》，臺北，1906。

### (三) 年鑑、工具書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7-1908。

《臨時臺灣糖務局第六年報（明治四十年度）》，臺北：臨時臺灣糖務局，1908。

杉野嘉助編纂，《臺灣糖業年鑑》，臺北：臺灣通信社，1927。

烏海靖編，《歷代內閣・首相事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9。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

## 二、近人專書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2011。

黃紹恆，《砂糖之島：日治初期的臺灣糖業史 1895-1911》，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

駄場裕司，《後藤新平をめぐる権力構造の研究》，東京：南窓社，2007。

北岡伸一，《後藤新平》，東京：中央公論社，1988。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

木下知威編，《伊沢修二と臺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 三、近人論文

小林道彥著，李文良譯，〈後藤新平與殖民地經營——日本殖民政策的形成與國內政治〉，《臺灣文獻》，48：3，南投，1997.9，頁101-121。

伊藤桃子，〈日本明治政府司法省顧問盧朋的殖民地統治構思：以遼東、臺灣統治政策論為中心〉，《大仁學報》，39，屏東，2011.9，頁35-63。

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檢」之展開〉，收入黃富三等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23-24。

吳文星，〈新渡戶稻造與日本治臺之宣傳〉，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 編，《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93，頁31-41。
- 吳密察，〈外國顧問W. Kirkwood的臺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93，頁1-27。
- 林文凱，〈臺灣「中央財政」體制的轉型：日治初期（1898-1905）後藤新平總督府財政改革之歷史意義〉，《中央大學人文學報》，63，桃園，2017.4，頁1-44。
- 范燕秋，〈新醫學在臺灣的實踐（1898-1906）——從後藤新平《國家衛生原理》談起〉，《新史學》，9：3，臺北，1998.9，頁49-86。
- 張隆志，〈臺灣近代史上的後藤新平——歷史、神話與政治〉，收入徐天福編，《什麼人物 為何重要——臺灣史上重要人物（二）》，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1，頁36-51。
- 陳豐祥，〈日俄戰後日本的對『滿』政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6，臺北，1988.6，頁155-220。
- 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洲殖民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 上，臺北，1986.6，頁371-402。
- 蔡龍保，〈長谷川謹介與日治時期臺灣鐵路的發展〉，《國史館學術集刊》，6，臺北，2005.9，頁 61-108。
- 鍾淑敏，〈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統治權的確立—1895 年～1906 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89。
- 鍾淑敏，〈英商三美路商會（Samuel Samuel & Co., Ltd.）與日治前期臺灣的產業發展〉，《臺灣史研究》，25：2，臺北，2018.6，頁97-143。
- 鍾淑敏，〈試論後藤新平與伊澤多喜男——從專賣局與鴉片事件談起〉，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編，《日據時期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頁333-340。
- 王鉄軍，〈台湾総督府官僚と関東都督府の設立—植民地間の官僚交流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檜山幸夫編，《帝国日本の展開と台湾》，東京：創泉堂，2011，頁199-214。
- 岡本真希子，〈植民地統治初期における臺灣総督府法院の人事—判官・

- 検察官の任用状況と流動性を中心に一〉，《社会科学》，48：2，京都，2018.8，頁239-275。
- 季武嘉也，〈大正期における後藤新平をめぐる政治状況〉，《史学雑誌》，96：6，東京，1987.6，頁1-31。
- 長谷部茂，〈西洋人は日本統治以前の台湾社会をどう見たか：総督府英国人顧問マイヤース「台湾自治制度」意見書を事例として〉，《拓殖大学台湾研究》，創刊號，東京，2017.3，頁29-52。
- 斉藤容子，〈桂園体制の形成と台湾統治問題〉，《史学雑誌》，103：1，東京，1994.1，頁63-85。

## **Goto Shinpei and the Consultant System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Wang, Chi-ming\*

### Abstract

In April 1906, Kodama Gentaro, who had served as Governor-General of Taiwan, became the chief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General Staff Office. He was succeeded in his position by Sakuma Samata. Goto Shinpei, who had been serving as the Civil Administrator of the Governorate-General of Taiwan since 1898, remained in his position as head of Civil Affair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Japan subsequently invited Goto to serve as President of th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rporation. Following close negotiations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Goto agreed to take on the new job, after it agreed to a set of conditions he had laid down. In November 1906, Goto traveled to Manchuria while concurrently serving as consultant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and the Kwantung Governor-General. In 1908, Goto attempted to resign from his consultant position. In July of that year, a new cabinet was formed, and Goto was invited to serve as 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s. This allowed him to resign from his consultant position, which he had held for less than two years. Although his tenure was brief (from November 1906 to July 1908), Goto was able to retain his influence in Taiwan by directing the actions of his successors. This paper, by exploring personnel affairs in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Goto's power, as well as its significance. It looks closely at how Goto was able to step down from his position as head of Civil Affairs, while remaining in his role as consultant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

\*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This paper, which regards Goto as a case study, also aims to shed light on how the Japanese colonial consultancy system of the time operated.

**Keywords:** Goto Shinpei, Kodama Gentaro, Sakuma Samata, Iwai Tatsumi, Consultant of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